

批林批孔材料

(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教学组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

目 录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 的头子都是尊孔的.....	(1)
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24)
名词解释.....	(46)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指出：“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继续深入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把批孔和批林结合起来，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我们汇编了一组资料，供广大工农兵同志批判时参考。

尊死圣人，从来是为了尊活“圣人”。反动派头子尊孔是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是为了推行其反革命政治路线；外国反动派尊孔是为了“灭中国”。而尊孔又都是尊反动派，是为了倒退、复辟，这就是这些历史资料所提供的见证。

《文汇报》编者

孔子的最早吹鼓手

孔子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孔子的学生，受其“教誨”，得其真传，承其衣鉢，他們拜倒在孔子的脚下，大肆吹捧孔子。子貢就是吹捧孔子的一个典型。他吹捧孔子是天生的“多能”，是天降的“圣人”，还说孔子“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把孔子的学問夸成“不可及”的“頂峰”。当时有个叫叔孙武叔的，講了些孔子的坏話。子貢听了，非常恼火地说：“孔子是毀謗不了的。”接着便肉麻地吹捧孔子，说什么：“別人的賢能好象山丘，总还可以超越的；孔子嘛，好象太阳和月亮，沒有可能超越它。”孔子的孙子子思則把孔子吹捧成“尧舜”、“文王”。

那个被儒学后代称为“亚圣”的孟子，更把孔子捧得很高，他狂热地吹捧孔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还说什么“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完全接过了孔子的反动主张，在经济上顽固站在孔子的反动立場上，竭力维护土地分封制度，主张“正经界，复井田”；在政治上继承了孔子的“好古”、“复礼”，公然提出“法先王”的倒退主张；在思想上，發揮了孔子的天命觀，宣揚“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帶了一批学生东奔西窜，游说各国，兜售孔子复古倒退的黑貨。孟子是地地道道的复辟奴隶制度的孔家店二老板。

历代帝王对孔子的追諡加封

儒家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尊儒也就是尊孔。从汉朝一直到

清朝，不少封建皇帝都演出了一幕幕尊孔的丑剧，对孔子纷纷追谥加封。

孔子死后第一次得到封建帝王赐予的封号，是在西汉平帝时，被追谥为“褒成宣尼公”。王莽更是推崇孔子，他还按照古礼在长安建造“明堂”等祭祀的场所，使之成为全国尊孔崇儒的中心。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爬上帝位的第一道诏书，就肉麻吹捧孔子是“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还命令重建孔庙，派人守卫，并在曲阜立起学宫。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孝文帝追谥孔子为“文宣尼父”，并特地到曲阜祭孔子。北周的统治者也追封孔子为“鄴国公”。

隋唐对孔子有不少追谥加封。隋文帝追谥孔子为“先师尼父”。唐太宗尊奉孔子为“先圣”，还把周公孔子的一套说教，当成是“失之必死”，“不可暂无”的“宝贝”。到了唐玄宗时，不仅尊孔子为“文宣王”，而且还追赠孔子的弟子以“公”、“侯”、“伯”等名号。他曾亲自到曲阜祭孔，还写了诗表示对孔子的尊崇，并且亲自注《孝经》颁行，大肆宣扬孔子的儒学。

唐玄宗把孔子捧上了王位是一个开创，自此以后，便尊孔为王。可是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觉得称“王”还不够尊崇，于是，宋真宗又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为“至圣文宣王”）。到了元朝，元武宗又别出心裁地在“至圣”前面加了“大成”两个字，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到了明代，朱元璋称帝时，对孔子仍然沿用“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封号，下令各地立学读经。嘉靖时，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清代皇帝对孔子的追谥加封更是狂热。顺治时，加封孔子

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乾隆也都到曲阜“朝圣”。历代帝王吹捧孔子，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他們的封建統治。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西汉的反动思想家董仲舒，景帝时曾作博士官。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依靠“举賢良对策”，取得汉武帝的赏识重用。他对武帝说：現在各家的学说到处流传，很不利于封建統治。因此，董仲舒建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凡是不合乎孔孟之道的学说，全部予以禁止，只讓儒家的学说流行，认为这样做思想就可以統一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就巩固了。董仲舒还建議汉武帝兴办学校传播儒学，培养反动統治人才。

董仲舒还發揮孔子的“天命”观，宣揚了“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说，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論根据；为了把封建秩序固定下来，又引用了孔子的“正名”说，提出“三綱”的理論；他还發揮了孔孟的唯心主义先驗論，提出所謂的“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筭之性”。他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中等的“中民之性”是可以通过教訓、学习漸漸变为善的；至于劳动人民的“斗筭之性”則天生就是愚蠢的，只能接受“圣人”的統治。这就是用先驗論来論証封建統治秩序是絕對“合理”的。汉武帝完全接受了董仲舒的整套主张。自此以后，孔孟儒学成了封建統治階級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鎖。董仲舒也被尊为儒学群首和“汉代孔子”。

自命为孔孟继承者的韩愈

唐代的韩愈，是继董仲舒之后吹捧孔子的又一个代表人物。他在政治上打击当时的进步势力，吹捧孔子是“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其賢过于尧舜远者”，说孟子是“功不在禹下”，并提出了“道统”说。他说：“吾所謂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湯，湯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传焉”。他自命是孔孟道统的继承人。

他宣揚孔子的“仁”。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謂义，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謂德。”意思就是说：“仁”就是“博爱”，“义”就是行为适合道理，“道”就是朝“义”的方向去做：“德”就是自满自足对外无所求。用孔孟虛偽的仁义道德来欺騙人民。他还鼓吹孔孟、董仲舒的人性論，提出，“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就是“三綱五常”的五常。

韓愈根据孔孟的反动天命觀提出：“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甚至学着孔子的腔調叫嚷：老百姓如果不甘受压迫、受剝削，就要杀头。足見，韓愈宣揚孔孟之道是为了維護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剝削。

朱熹是孔孟之道的忠实卫道士

朱熹，南宋人，是继孔、孟之后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复古派。他的反动哲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居統治地位有数百年之久。他編成的《四书集注》，被欽定为宣传孔孟之道的必读教材。

朱熹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討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朱熹又说，孔子虽沒有能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他继往圣开来学，承上启下，其功反而賢于尧舜。朱熹继承了孔孟之道，又发挥了孔孟之道。他认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是“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間”的永恒規律。“若臣处君位，君处臣位，安得和乎？”因此朱熹看来，“綱常万年，磨灭不得”。

朱熹认为文王、周公、孔子所处的社会，也就是周朝的奴隶分封制，是历史上的“盛时”，自孟子死了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他说，“千五百年間，……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間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文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朱熹和孔孟一样，也是一个“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复古倒退派。

王守仁吹捧“孔孟之訓，昭如日月”

王守仁，又叫王阳明，明朝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他政治上非常反动，以“破山中贼”，即镇压农民革命为己任；思想上是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派，以“破心中贼”，即破不符合孔孟之道的唯物主义为目标。就是这个反动思想家，把孔孟之道捧上了天，提出“孔孟之訓，昭如日月”的口号，认为“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螢燭之微也”。他认为“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还别出心裁地用重量来权衡孔子，说“孔子

有九千镒，禹湯文王有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孔子的身价被大大抬高了。

王守仁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持明朝封建统治，每到一处，总要写不少“告父老子弟书”，宣扬孔孟的“孝悌忠信”，要求“各家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俭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他还继承并大大发扬了孔孟“良知良能”的唯心论先验论。他把自己的“致良知”的哲学，说成是孔孟的“道脉”所在。他又说：“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竭力鼓吹孔孟复古倒退的谬论。

口颂孔孟手执屠刀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大刽子手。他口颂孔孟，手执屠刀，目的是要维持摇摇欲坠的清朝地主阶级的统治。

曾国藩称孔子是“圣之盛也”，发誓“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他还夸耀自己是孔子学生曾参的后代，并亲去孔庙朝圣，顶礼膜拜。对于太平天国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孔运动，曾国藩如丧考妣，说太平天国的行动“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使“士不能诵孔子之经”，“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为此，曾国藩下了很大的反革命决心，“誓将臥薪尝胆，殄此凶逆，……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

曾国藩大力鼓吹孔子的反动思想核心——“仁”。他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

以平物我之情，而思于天下之事，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又说，“仁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恕道也”。曾国藩口称“仁”、“恕”，实际上是一个极度凶残的“曾剃头”，攻破南京后，三天之内他就杀了太平军十多万。这是对孔子的“仁”、“礼”、“恕道”的最好的注释。

曾国藩还特别起劲宣揚孔孟的三綱五常，忠孝节义，认为“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彻底暴露了曾国藩尊奉孔孟儒学，維持三綱五常的反动面目。

袁世凯用孔子作“敲门砖”复辟帝制

辛亥革命以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头子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利用孔子的亡灵，作为爬上皇位的“敲门砖”。

一九一三年六月，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宣称：“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詳細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宣布恢复祭孔典礼，作为复辟帝制的一个輿論。一九一三年十月，他正式就任大总统，提出“道德为体，法律为用”。他的道德就是儒家的旧道德，即“忠、信、篤、敬”。袁世凯集团又炮制了《宪法草案》，規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接着又制定《教育綱要》，規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賢，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

一九一四年二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一律施行祀孔典礼，規定“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同时，还公布《崇圣典例》，規定孔子后裔仍旧“膺受前代荣典。”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率領百官，穿起古怪祭服，举行了辛亥革命后的第

一次声势赫赫的祀孔盛典，并令各地方长官在各地孔庙也主祭孔子，达到了民国以来尊孔复古的高峰。一九一五年又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

紧接着尊孔读经而来的，就是洪宪帝制丑剧的演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筹安会”拼凑出籠，該会发起人楊度发表《君宪救国論》，用孟子的复古思想，宣揚“定于一”，为袁世凯称帝找根据。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登上皇位，称“中华帝国皇帝”，决定次年改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在一片討袁声中一命呜呼了。

康有为与张勋的尊孔闹剧

袁世凯垮台以后，“永定为复辟的祖师”的康有为勾結封建军阀“辦帥”张勋，又演出了一幕尊孔复辟的鬧剧。

号称“武圣”的张勋和“文圣”的康有为，一唱一和。张勋一面拚命在军事、政治、組織上作复辟准备，同时，又发表了《上大总统請尊孔教书》，吹捧孔教“如日月经天”，“为人生日用之必需”，“汉唐以降，下迄明清，虽然几经改朝换代，但尊崇孔教是一致的”等等。张勋还凭借手中的枪杆子，“分兵据守”孔庙、孔林，对孔庙、孔林、衍圣公府的一切特权都“一律妥加保护”。康有为則伙同清朝遺老、封建余孽掀起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他們組織“孔教会”、“孔道会”，创办《不忍》杂志，搖动秃笔，发表尊孔文章，大肆进行尊孔活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他們在山东曲阜两次举行祀孔典礼。还請孔子四十四代孙“衍圣公”孔令貽講经，有人在祀孔时仍行三跪九叩礼，口称“孔教万岁”。尊孔复古思潮猖

猴一时。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后，张勋通过四次徐州會議，取得十三个省区反动军阀“盟主”地位。这期间，又发表了康有为草拟的“請訂孔教为国教”的电稿。主张把孔教作为“国教”訂入宪法。康有为还宣揚：“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一九一七年三月，康有为又致电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和內务部“請飭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康有为甚至叫嚷：“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乎？”

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张勋利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斗争，以“調停”为名，率領五千辫子军北上。提出“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訂孔教为国教”。二十八日，“文圣”康有为带着早在上海起草的伪詔，匆匆化装入京。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清帝溥仪复位的鬧剧正式演出。成群的清朝孤臣孽子涌入北京，一个个好象是棺材里跑出来的“古董”。但是这一出鬧剧，只演了十一天就草草收場了。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张勋狼狽逃入荷兰使館，康有为伙作鳥兽散，溜出北京，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反动买办文人胡适尊孔的丑态

胡适是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动买办文人、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帮凶、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儒家复古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和頑固維護者。

五四时期，胡适作为资产阶级的右翼，曾经混入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但是，他压根儿就没有真正触及过孔孟之道一根毫毛。五四运动以后，“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响遍全国。斗争进一步深入。这时，胡适就“忍不住”了，一九一九年七

月，胡适就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在《每周評論》上拋出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这一反动文章，公开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传播，反对五四运动所进行的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此后，胡适不仅为孔子大唱贊歌，說孔子是“积极的救世派”，是为了“改良社会国家”而“孳孳恳恳終身不倦的志士”，并亲自怀着恭敬的心情，去謁見早已被废黜了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胡适奴顏婢膝，受寵若惊，口称“皇上”，鞠躬行礼，充分暴露了胡适沒落倒退的阴暗心理。胡适又扯起“整理国故”的破旗，并为青年开出了一大堆“国学书目”，諸如儒家学派的《四书》、《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类都成为“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这种复古主义的号召，就是企图把青年从火热的斗争中拖进故紙堆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一九三四年起，由国民党自上而下倡导，一批反动御用文人自下而上配合，又一次掀起一股以“尊孔读经”为中心的复古逆流，对无产阶级发动了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此时，胡适又紧密配合，拋出了反动文章《说儒》，大肆提倡尊孔。把孔子捧成是什么应运而生的“救度全人类的大圣人”，孔子的“仁”是“那用整个人类为对象的教义”，同时，又把孔子乔妝打扮，說孔子是亡国民族的“大儒”，“富有亡国遺民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观”和“‘吾从周’的博大精神”等等，胡适的这一反动文章，不仅成为当时复古运动的組成部分，而且也是直接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制造輿論。

蔣介石集团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以后，跟着蔣介石滾到海島上去的胡适，在一九五四年还作了一个所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的演講，大肆吹嘘孔子“仁”的哲学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攻击法家商鞅在秦国实行“极权政治”，咒罵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文献”。妄图用尊孔反法的破烂武器来为蒋介石的反动統治打强心針。

蒋介石是一个极端尊孔的反动头子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也是一个“极端”尊孔的反动头子。他于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就亲赴曲阜朝圣，頌揚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并在“保护”孔孟的“文化和德性”的旗号下，进行了血腥的“清党”罪恶活动！

在十年內战期間，蒋介石集团对革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尊孔读经就是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們把孔孟之道同法西斯主义結合起来，一九二八年，他們发布保护孔庙令，赤裸裸地说：“保护孔庙之文，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鏟除”。蒋介石还把孔门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所謂“八德”作为自己的“党魂”、“国魂”。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又特別通过了“尊孔祀圣”的決議，还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紀念日”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把中国拖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又抬出孔子这具僵尸。一九四三年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吹捧孔孟之道，胡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創导，孟子的闡揚，汉儒的訓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宣揚孔门的“四維八德”，是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在此期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变本加厉地提倡尊孔读经的复古运动，鼓吹“欲完成建国大业，端在

儒家思想的复活”，为巩固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制造舆论。

蒋介石被赶出大陆后，更疯狂地鼓吹尊孔复古。蒋帮在台湾搞了一个“孔孟学会”，叫嚷要用孔孟之道对中国共产党“作全面的思想战、文化战、主义战”。一九六〇年，蒋介石又肉麻地把孔子吹捧成“一位政治思想的革命家”，妄图用孔孟之道鼓舞“士气”，反攻大陆。高喊：“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乃就成为我们民族主义的伦理思想的根据。”真是反动透顶。前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大搞祭孔活动，蒋介石的“特派代表”在祭孔典礼中“上香行礼”，竭力鼓吹“孔孟之道”，攻击我们的批孔。但是，不管这些反动派如何抱住孔子不放，孔子的亡灵仍然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厄运！

陈独秀是混入党内的最早尊孔派

陈独秀是党内第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后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堕落为对革命。五四运动时期，他虽曾参加过批判孔子思想的运动，但随着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出卖和叛变，很快就背叛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沦为尊孔小丑。这个已经堕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的托陈取消派头目，抛出了《孔子与中国》等黑文，大肆颂扬孔子，鼓吹孔孟之道，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批孔运动进行疯狂的反动倒算。他无耻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大肆叫嚣要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说什么“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

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还说“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綱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陈独秀还大肆宣揚孔子的“仁 恕 忠 信”和“三綱”礼教，把孔孟之道看成是“东方文化与文明”。

与此同时，根本不懂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还抛出了长篇累牘的《实庵字说》（实庵即陈独秀），胡说中国是由氏族社会瓦解后就进入封建制社会的，不象希腊、羅馬那样，由奴隶而进入封建制。否认中国有奴隶社会存在，这不仅否定了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且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子是一个頑固維護奴隶制的思想家这一正确論断。陈独秀的这个謬論，与当时托派分子的叫囂，如出一轍。

陈独秀把法家说成“本是儒家的支流”，胡说旧礼教“創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韓非、李斯”，妄图抹煞儒学与法学的对立，把法家说成是儒家的继承者，否认階級矛盾，否认奴隶主階級和新兴地主階級之間在思想、政治領域的階級斗争，否认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两种新、旧社会制度的斗争。陈独秀这样做，决不是为考証而考証，而是为了否定当时现实存在的中国人民与“三座大山”的矛盾，为推行投降主义、取消主义制造理論根据。

王明的尊孔与投降卖国

叛徒、卖国贼王明，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綫的头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綫，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綫的代表。王明的右倾路綫是彻头彻尾的階級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路綫。

王明为了推行其投降主义路线，抬出了孔子的亡灵，大肆散布尊孔谬论；而孔子的反动学说，则被王明吸收和发挥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明对孔子的思想不进行阶级分析，反而跟在蒋介石屁股后边宣扬“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胡说孔子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王明从孔子的“仁爱”出发，要求“原来敌对的阶级，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要人们不分阶级地实行孟子所鼓吹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人之老如吾老，幼人之幼如吾幼’）”。王明自己把孔孟的“仁、爱、礼、义”之类的货色奉为民族至宝，看成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中一切优秀和有价值的东西”，并要共产党员成为“真正的继承者”。王明利用孔子的腐朽思想来冒充全民族的思想，正是为了配合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论调，为他搞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

王明为了掩盖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实质，还搬出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说教，并把它说成“是中华民族中优秀代表的传统光荣”，要人们去“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举”。他鼓吹孔孟的这一套，完全抹杀了抗日战争的阶级内容。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奉苏修主子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华旨意，配合社会帝国主义疯狂反华、反共、反革命，又重新祭起“尊孔”的破旗，把腐烂了二千四百多年的孔子僵尸吹捧为“堂堂夫子”，恶毒咒骂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进一步暴露了王明投降卖国的叛徒嘴脸，也充分表明一切卖国贼都是尊孔派。